

論衡

語言直如聖器，話語分析真如金鑰

——文論範疇研究的未來通徑

汪涌豪

二十世紀後半期，西方史學研究發生“語言學轉向”，影響及研究方式和敘事方式也發生一系列改變。文學史、文論史乃至美學史研究，不可能自外於這個潮流。傳統文論範疇研究局限於字義疏證，新的理論與方法將為之開辟出更廣大深遠的新境界。

一直以為，中國古代文論自體性的獲得是通過文論範疇研究實現的。這不僅因為範疇是對古人文論零散的創作經驗的歸納，還因為它以感性經驗為對象，以辯證思維為方法，最大程度地用一種純淨化的邏輯形式，指向深層次論證的必然和必然。

至於在上世紀90年代成為本領域研究新的增長點，許多人認為是得益於張岱年為代表的中哲史研究的啟發。其實，今天看來，陳寅恪將字義考辨納入文化史研究，早已導夫先路。

1936年，沈兼士寫成《‘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寄他指證，他答以“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聯繫其《元代漢人譯名考》一文稱“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紛紛訛謬，即因茲細故而起，此尤為治史學者所宜慎也”。他的旨趣顯然超越了傳統的訓詁學，而囑望於由字詞闡明一段歷史、甚或一種觀念的氣象更闊大深遠的新學問。以後沈兼士《殺、祭古語同原考》一文稱“考證文字之作，多流於破碎支離。即能以精義古音貫串證之，猶嫌未足。必也當于字形音義演變之原委，文藝史上交流分化之形勢，及其與古代文化史之關係，三者具有綜合一貫之見解，方為合作”，正是對其說的引伸與貫徹。

另一方面，海通以還，中西互鑒之風大興，在以西學說較諸夏的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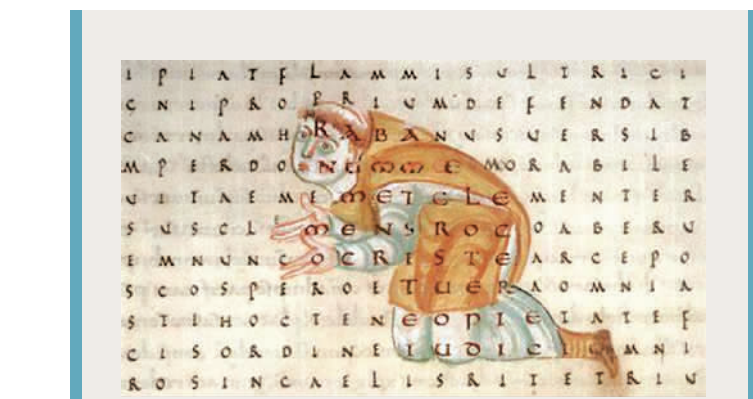
程中，也有對西學話語的研究與延用。如王國維基於漢語多“實際的”“通俗的”，西方多“思辨的”“科學的”的事實，撰成《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主張引彼“新學語”，即新的範疇、概念、術語以補國人“言語之不足”。“新學語”的輸入，實際上為人們提供了發現問題和認識問題的新的視域。他并身體力行，嘗試用這些新語匯闡釋傳統文學與文論，由此造成的新的語言認知模式，對其學術思想的構建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張大了王國維學術思想的科學特性，并很大程度上賦予了這種思想以巨大的創化功能。

其時，梁啟超編《新民叢刊》，也常從“驛路”日本引入西人的新語匯。類似的對看，結合甚至移植，推動了傳統名詞術語與西方學術話語的彼此溝通與交流，使一種不脫時代、同時更契合中國傳統的學術新話語得以創化成形，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因此成為可能。當然，與此同時，它也从另一個方向將傳統的字義研究推向了深入。

到二十世紀後半期，西方史學研究發生“語言學轉向”，影響及研究方式和敘事方式也隨之發生一系列改變。

其中由重視詞語研究，到認定詞語昭示意義和精神的觀念史的興起——在中國主要體現為對西方近代概念的接受研究——并行成重要的流派。它基於詞語史而歸于觀念史，前者關注概念被命名的歷史，後者是概念經由意識形態化後的理解與運用。由於兩者皆聚焦或歸于概念，凸顯了概念的重要地位，考察詞語的概念化過程與旨在揭示社會歷史變遷邏輯的概念史研究，因此得以成形。用德國歷史哲學家科塞雷克《歷史語言學與概念史》一書中的表述是，通過考察重大概念在不同歷史語境中的影響，可以幫助人在各種要素的結構變化中呈現出完整的社會歷史，故堪為史學研究的新範式。

文學史、文論史乃至美學史研究作為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不可能自外於這個潮流。英國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在所著《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一書中指出，受索緒爾和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影響，當代文學領域曾掀起過一場“語言革命”，其標誌是“承認意義不只是用語言‘表達’和‘反映’的東西，它實際上是被語言創造的



▲ 9世紀手稿上的僧侶，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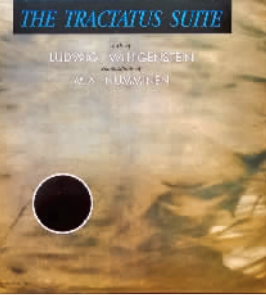


▲ 維特根斯坦影響甚巨。曾有作曲家將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改編成音樂，寫成《邏輯哲學組曲》。

東西。并不是好像我們有了意義和經驗，然後我們進一步替它穿上詞匯的外衣。首先我們之所以有意義和經驗，是因為我們有一種語言使兩者可以置於其中”，某種意義上就可視作是這一潮流的回響。故基於由詞匯呈現出的文化對語言的規定，到由語法呈現出的語言對文化的影響，再結合古人的心理結構和思維方式，由其談話的即興隨意，進入其內隱的語言運動及其外顯的名言構造，對文論範疇所蘊含的意指義理予以澄清和開顯，是很可以為揭示古代文學批評的內在肌理與本質特徵提供助力的。

但遺憾的是，既有的古文論研究明顯偏重於對原文、文質、文風論和文用論的空泛討論上。即使落實到具體的概念、範疇，也常因缺乏上述認識和方法論自覺而流於單個具體的狹義詮釋，而少有廣義綜括和彙貫歸納，體

系探究就更談不上了。總之，於範疇的性質、指域、分布和層次的了解都很初步，對那些與傳統文學程式化特徵高度匹配的形式範疇更少涉及。古代圍繞聲韻、格律、體段、調式等技術要素展開的形式範疇非常豐富。它們在詩論中體現為正體、辨字、造語、琢句、貞韻、申聲、屬對等事，在文論中體現為賦體、布格、賦格、制法、造句、排調等事，在詞論中體現為煉字、協韻、曼聲、促拍、改字、設色等事，在曲論中體現為分節、揭調、依格、轉音、合板、修容、吊場等事，在小說論中體現為影寫、立局、配映、避犯、提照、轉接等事。可謂分門多而設體繁，創格細而立法嚴，并還孳乳一系列專門名詞，諸如“致語”“翻脫”之于詞學批評，“分間”“渡接”之于文章學批評，“借宮”“走腔”之于曲學批評，“作筭”“布线”之于小說批評，等



▲ 維特根斯坦影響甚巨。曾有作曲家將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改編成音樂，寫成《邏輯哲學組曲》。

等，可謂不勝枚舉。但因比較瑣屑，常被視為形式枝節，有許多至今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更不要說被實質性地納入古代文學批評的“元結構”，給予整體性的系統解釋了。可事實是，如果小說批評不研究“作筭”，不進一步關注由其細分出的諸如“出筭”“入筭”“接筭”“合筭”“伏筭”“插筭”“結筭”等事，并不能配合着對“布线”的了解，由其所講“作筭”“引筭”論及更具體的“伏筭”“過筭”諸法，如何能了解古人意匠經營的精妙，及這種意匠經營之于西方小說結構理論的關係。言之，上述形式範疇彼此交涉映射，不但專業化程度高，并且愈往後層析得愈深細，既是古人真正的興趣所在和念茲在茲的關注重點，也是傳統文論尤其其中創作論的真正核心之一。現在的文論史研究只聚焦“虛靜”“神思”“興會”“妙悟”等有數的几个抽象範疇，并希望藉此涵括古人的創作論，顯然不够全面。

要之，正如研究人的物質生產方式离不开工具，研究人的精神生產活動离不开範疇。有鑒於古文論的實體構成許多時候凝滯於範疇，及由範疇結成的一系列命題與判斷，作為對創作一批評經驗的反思與提純，它與古人的文學實踐一直存在着良好的互動關係，既富於原型意味，又極具牽衍生長能力，足為理解古人的創作原則、审美理想，乃至一個時代社會文化實踐的理論意義提供支撐，實在應該獲得足夠的重視。而其應和着上述概念史研究的理念，又與近些年“語言學轉向”背景下，重在探究語言意識、知識權力與文明制度關係的話語理論相順適，如此預流的理念迭代與路徑轉換，為學人的研究提供了足夠廣闊的空間。

語言直如聖器，話語分析真如金鑰。只要我們合理借鑒并運用好上述理論與方法，再結合巴赫金、阿爾都塞等人的論說，包括從考古分析到譜系分析，對話語構成規律、實際影響和創造主體都作出過系統研究的福柯的相關論說，從關注語言形式本身，深入到其背後更廣闊的文化指涉與隱喻，我們必能由語境還原到意義開顯，為局限於字義疏證的傳統文論研究開辟出更廣大深遠的新境界。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德性與靈魂

劉欣茹

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以身證道，欣然赴死。《斐多篇》中，柏拉圖圍繞蘇格拉底之死，將德性與靈魂聯繫起來。以往的哲學家們僅將自然當作哲學研究的對象，而從蘇格拉底始，哲學被帶回人的當世，“德性(aretē)”被確定為人之為人的本性。

蘇格拉底提出“德性(aretē)”即知識，認識論中的“真”與道德論中的“善”在德性倫理角度互相關聯。作惡被歸因於無知，當認識的本性之後就會發現“善是人的內在靈魂”，而“無人有意作惡”，這一“人性本善”的思路為柏拉圖進一步探討靈魂不朽與德性生活的統一性問題奠定基礎。

蘇格拉底認為“萬物生成，有合有分”，靈魂不僅在身後獨立存在，還具備在肉體上輪回再生的能力。承載知識的靈魂回憶也隨着靈魂的輪回再生而得以永續。學習知識被看作是進行一種回憶，德性、智慧來源於靈魂中的記憶。“我們必然是在某個先前的時間中學得我們現在回憶起來的東西。可是，如果對我們來說靈魂在這樣一個屬人的形相中出生之前并不曾在某個地方的話，這恐怕設可能。所以，靈魂由此也顯得是某種不死的东西。”德性作為至善真知與靈魂一道同生同行，德性與善知以先天普遍的形式潛存於人們的靈魂當中。通過對知識不斷的回憶，靈魂將會與這種善越來越接近，而越接近就會越幸福。

由生前求知愛智的德性生活，蘇格拉底自認獲得了關於死後靈魂世界的奧秘，認為靈魂是不朽的，并且不同的靈魂會有不同的歸處與境遇。

哈得斯在希臘神話中通常指冥府或冥府之主，在《斐多篇》末尾，靈魂踏上了去往哈得斯的冥府之路，壞人的靈魂與明智的靈魂將在路途中被指引到不同的地方。承繼畢達哥拉斯派關於“命分(moira)精靈”的說法，柏拉圖認為在哈得斯之路上這些命分精靈會分配懲處，帶領靈魂擺渡到與其相配的居所。當靈魂被交付審判後，會分別去往四條河流：環河、哀傷河、火灼河、哀嘆河。在河邊，“不可救藥”的作惡者將會被直接處死，只有“尚可救藥”的作惡者才能擁有去贖罪、潔淨自身的機會；而那些本就潔淨的靈魂則會獲得自由和釋放，去到清淨的居所。

審判程序的介入使靈魂不朽說在柏拉圖哲學中的警世意味愈發清晰，其中內含靈魂對德性生活的規範：其一，追求德性不止能為現世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還能為靈魂的來世再次提供幸福生活的可能；其二，靈魂的不朽使人們對來世的歸屬產生危機感與期望感，從而使人們減少對肉體快樂的裝飾和追求，更關注靈魂的滿足。安頓靈魂的方法不再是滿足肉體的樂欲，而是“用靈魂自身的裝飾而非用不相干的裝飾來安頓靈魂，亦即用節制、正義、勇敢、自由和真實來安頓靈魂……”靈魂要想清淨、免于懲處，需要依靠的不是宗教神諭而是靈魂本身，即靈魂內在的德性力量。

蘇格拉底之死給柏拉圖留下了“靈魂”這一極具指示意義的遺產，靈魂概念由此進入了不同于宗教神話的倫理道德視域。在《理想國》中，人的最大幸福被定義為：能夠摒除痛苦的生活模式，避免受惡之苦。德性與幸福相對等，德性給予靈魂“去選擇”的可能性。柏拉圖對“人應當如何生活”這一終極問題的答復，通過靈魂不朽說將德性與幸福相統一，最終體現了“追求德性就是在追求幸福”的德性倫理學觀點。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橫讀還是縱讀

沈有乾的中文閱讀眼動實驗研究

韓蒙如

文字的異同要點，此外別無浓厚的興趣。”在沈有乾的那個時代，心理學的實驗儀器及技術尚處於探索階段。為了完成研究課題，心理學家們往往需要自己改進甚至發明儀器。沈氏的導師邁爾斯就曾對“登記眼動的照相機”加以改良，採用照相記錄法(photographic recording)來研究閱讀行為。此種照相機并不直接拍攝眼珠，而是記錄眼動軌跡，從而能夠測量人們閱讀時的注視次數、注視停留時間、閱讀速度等眼動行為。沈有乾掌握了這一研究方法，同時他意識到，中文和英文閱讀存在着顯著差異：中文通常呈縱向排列，而英文則按橫向排列。文字排列方向的不同，會不會影響閱讀的效率和流暢性？這在當時還是個幾乎沒人涉及的新問題。

與橫向排列的拼音文字(例如英語、俄語等所使用的書寫系統)不同，漢字的書寫方向自創始之初，向來是自上而下、縱向書寫。在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發明之後，仍是如此。某些看似由右往左寫的橫書，例如牌匾等，實際上可以看作每行只有一個字的縱書。到了十九世紀，橫排中文書籍開始出現，比如英國傳教士馬禮遜《華英字典》、盧懋章《一目了然初階》(漢字與拉丁文拼音對照)等。但直至二十世紀初，橫排的中文書籍依然不多見。

“五四”運動以後，有關漢字和漢語改革的討論持續不斷。廢除漢字、推行漢字拉丁化，以及漢字是否應橫向排版，都成為當時的熱議話題。除沈有乾以外，熱心於運用心理學實驗手段研究漢字問題的學者還有艾偉、周先庚等。在《漢字問題》一書的序言中，艾偉提到：“何種字易于學習？何種字难于學習？從教學經驗中

固可探知一二，然而欲窺全豹必須用實驗方法作大量初學者之心理觀察，并須控制其情境以探知其學習歷程，如是則症結所在不難查出，改進之道方能求得。”相較而言，沈有乾則更有志于填補相關學術領域的空白。

1925年，沈有乾與邁爾斯合作在《實驗心理學雜誌》上發表了題為《中文橫向與縱向閱讀的眼動照相記錄》的論文。這項研究包含兩個實驗，他們首先測試了11名在斯坦福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比較他們閱讀橫向與縱向的中文材料過程中的眼動行為，進而比較了兩個被試，即兩位作者本人閱讀橫向的英文和中文時的差異。隨後，沈有乾獨立發表了《中文閱讀的眼動分析》(1927)一文，對之前的研究加以改進，選讀材料，并增加被試人數。1926年，沈氏完成了博士論文《中文橫向與縱向閱讀：利用照相記錄法的實驗研究》。這一系列研究首次揭示了閱讀漢字與英文時注視停留的空間分布和注視次數存在顯著差異，并發現閱讀橫向排版的漢字所需的注視時間短于縱向排版。

值得注意的是，沈有乾并未直接探討漢字改革這一當時的熱門話題，也沒有直言其研究成果對於漢字改革的價值。沈氏在心理學對於華文行列問題有什么貢獻？(1933)中冷靜客觀地寫道：“或問現今中國書籍的行列或橫或直，究竟何優何劣？研究心理學者對此問題有什么意見可以貢獻？作者的回答是：心理學家對於這問題的意见未必比他人的意見有價值，除非他們的態度或者比較的公平些。這回答或者要使發問者大大失望，但在現有的心理學智識中實在尋不出什么依据，可以凭良心造作比較樂觀的結論。”沈有乾認為，無論是自己對中文

的眼動研究，還是周先庚、陳禮江、杜佐周等學者利用其他方法進行的閱讀實驗，尽管都採用了嚴格的實驗設計，但都不能排除閱讀習慣因素的影響。此外，沈有乾反對將實驗結果直接用來指導漢字改革的實踐，因為實驗研究的結果表明，橫向與縱向閱讀時眼動速度的差別極小，單凭仅有的研究，尚顯不足。

當然，沈氏并不反對採用實驗研究的方法來研究中文閱讀。在當時希望提高漢字識字率、掃除文盲的大背景下，他主張“不要徒說空話，不同實際，應用實驗方法去甄別判斷。一方面推廣，一方面實驗，積極進行，那才是真正解決文盲的辦法”(《識字與閱讀心理》，1932)。由此可見，作為心理學家的沈有乾，始終堅持抱以批判性的科學眼光，強調以嚴謹的態度參與科學普及工作，而非將停留在實驗研究的成果作簡單轉化。

有趣的是，較之于“騎虎難下”的博士論文，沈有乾更加傾心于邏輯學。在博士學習的最後階段，沈氏赴哈佛大學借讀，于是“對於邏輯真可以說是一見傾心。若非已與心理學結婚生子，一定會與她締白頭之約”。事實上，沈氏並沒有和他鍾愛的邏輯學“白頭偕老”，而是回到斯坦福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扎实的實驗研究方法和科學的統計學訓練伴隨了他後來長期的科研、教學及行政生涯。

在研究論文、學術隨筆之外，沈有乾在上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還曾創作過多篇小品文，散見於《論衡》《新月》等刊，文風以鮮活幽默見長。其回憶美國留學月月的文章後集為《西游回憶錄》(西風社，1941)出版(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再版，定名為《西游記》)。1948年第三次赴美後，他在很

長一段時間里不再從事學術研究，也很少發表隨筆、小品類文章。他最後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是《怀念六位美国业师》，回忆了在美国求学生涯中遇到的多位业师，尤其是与迈尔斯教授共同研究中文阅读的日子。

由于沈有乾从事中文阅读研究的初衷并非改革或改良汉字，因此他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对汉字改革运动产生过显著影响。事实上，那个时代在汉字改革问题上的呼声和实践，都没有给汉字的未来指明正确的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大力推行汉语普通话、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再加上中文打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中华各族人民能够更加容易地学习与掌握汉字的音、形、义，不仅方便，而且方便，同时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度也更高。现在，汉语和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其书写及使用已经写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坚实保障。

1955年，《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为《为本报改成横排告读者》的文章写道：“我们认为现在中国报刊书籍的排版方式，应该跟着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它的需要而改变，应该跟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文字的横排横写，是发展的趋势。”这一举措得到了全国响应，横排排版开始迅速普及。

可见，尽管沈有乾先生早年的研究未能直接左右汉字的前途和命运，但我们不应低估、更不应忘记他所做的贡献。作为利用眼动等现代技术从事相关研究的前辈学者，沈氏在心理学、语言学、统计学、逻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泽被深远，亦堪称深入，尤其是在中文阅读方面，更有推轮之功。在他之后的几十年间，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只有零散的研究，直到1980年代后才引起广泛的注意。时至今日，沈有乾的研究方法和结论仍然备受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在沈有乾身上所体现出的理性精神和审慎学风，正是“五四”前后留学归国的学者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沈有乾生于1900年，字公健，英文名 Eugene Shen (“Eugene”大抵取“有乾”的谐音)，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其父为同济大学第四任校长、教育家沈恩孚(1864—1944)。其弟沈有鼎(1908—1989)则是著名逻辑学家，师从金岳霖。沈有乾早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心理学，四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会长沃尔特·理查德·迈尔斯(W. R. Miles)。

1929年，沈有乾回到祖国，先后在光华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讲授心理学、逻辑学和统计学课程，并参与创建中国心理学会。1939年，沈氏再次赴美，在哈佛大学讲授教育测量与实验设计及统计方法，次年回国。1948年，沈有乾赴美任联合国秘书处考试与训练科负责人，1961年退休。1996年于纽约去世。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批留学美国的学者就已经开始运用眼动追踪(eye tracking)等科学实验方法研究中文阅读的特性，沈有乾就是其中的杰出先驱。沈有乾抵美国时，曾咨询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L. Terman)，讨论在心理学研究领域应该选择何种方向。特曼是智力测验领域的权威学者，当时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天才的遗传研究上，具体思路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公立学校寻找高智商儿童并对其进行测试与长期追踪。特曼曾对沈有乾说：“你是外国人，出去与学校或其他团体接洽测验，容有不便。应当致力于实验室内的研究。”(《怀念六位美国业师》，1986)沈氏听从老师的建议，并在修读过程中结识了实验心理学家迈尔，选择了以中文阅读作为研究课题进行实验，这些实验为他后来的博士研究课题提供了基础。

沈有乾在与当初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时说：“在士大(引者按：即斯坦福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了一门高级实验心理学。……那时士大心理实验室新装一架登记眼动的照相机，我因为阅读中国文字时眼动情形尚未有人用照相方法研究过，很想尝试这一种观察。当时我的目的只要发现阅读中西